

石湾 著

红火与悲凉

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

萧也牧、江晓天带领的优秀编辑团队，编辑出版了以《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为代表的优秀文学作品，在中国出版界创造了红火的业绩，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

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中真正的精英，红火业绩的背后，他们又各有令人叹息的悲凉命运

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神圣的职责和悲壮的力量，体会到前辈们的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和奉献精神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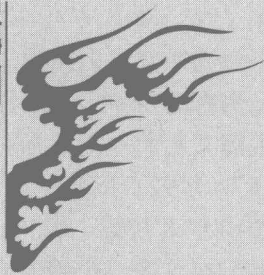
石
湾
著

红
水
泥

萧也牧

源

事们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石湾 著.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452-0573-2

I. 红… II. 石… III. 编辑工作-文化史-中国-现代 IV. ①
G239.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1884 号

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

统 筹: 孙 欢

责任编辑: 蒋逸征

装帧设计: 叶 珺

出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 楼

印制: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 1/18 印张 16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2-0573-2 / G·181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7780459

缘起

当我写完这部书稿时，正值2009年6月，忽然想起，我是在2004年6月从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的。至今恰好整整五年。我并不恋栈，但五年来，也许是几十年凝聚的文学编辑情结，文学出版界的历史云烟和时代风潮，依然时时刻刻在牵动我这敏感的神经。尤其是2007年，《文汇报》发表的一篇《“四大名编”的故事》，一下子触发了我要为我所景仰的前辈名编立传的心愿，我也选择了四位名编，即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王朝垠的故事，写成了《也说京城名编》一文。拙文在2007年10月7日《文汇报》上刊出之后，接连有好多位文学界的师友打来电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还有些未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打电话来问我要那期报纸看。而那时我尚未收到样报，就想先找一张给病得已骨瘦如柴的江晓天看看。我找到芳邻李兴叶先生，结果他说：“这张报纸我不能给你，因为你写的四个名编中，有两个是有恩于我的，江晓天是我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时的领导，还为我的长篇小说《帝国的草原》三部曲写过序。我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又是他推荐给李清泉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但对他俩在文学编辑事业上的成就我过去了解不多，所以，你这篇文章我得好好保存起来……”过了些天，我遇见兴叶兄，又说起这篇文章。他说：“可惜《文汇报》只能提供给你一个整版的篇幅，让人看得不过瘾。你能不能在此基础上，扩展成一本20万字的书呢？”

我当即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这是因为《也说京城名编》原本写了近两万字，除了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王朝垠，还写了张羽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名编，但想在报纸上发表，就不得不“削足适履”，压缩到一万余字，所以才使他读罢有了一种“不过瘾”的感觉。然而，有精彩故

事的京城名编何其多矣，即使是写二三十万字，恐怕也写不周全，无论遗忘了谁，都是一种不该原谅的憾事。于是，我就想，不如单写江晓天和萧也牧当年带领的那个出色的编辑团队。写这个团队的理由，我在《也说京城名编》一文的开篇部分，就提到了：

上世纪末，我在参与“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编辑工作时，发现从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入选的长篇小说共六部，除《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外，其余四部，即《红旗谱》、《创业史》（第一部）、《红岩》和《李自成》（第一卷），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此期间入选的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只有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也是出自中青社。由此可见，那时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实力，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然而，中青社担负文学图书编辑工作的，只有一个编辑室，江晓天、萧也牧当年分别是编辑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他俩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了张羽（《红岩》责编）、黄伊、毕方（《创业史》第一卷责编）、王扶（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批优秀编辑，形成了一个精诚合作的集体，在抓稿、编稿方面自有一套非凡的功夫。

兴叶兄很赞赏我的这个采写方案。于是，我就先奔江晓天家，开始了采访和资料的搜集工作。老江很谦虚，说：“你就不用写我了吧，集中精力先写萧也牧吧。他是建国后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红旗谱》的责编、《红旗飘飘》丛刊的创办人，‘文革’中又为保卫《红岩》被整死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不是其他名编辑可以替代的！我觉得，你能为他立传的话，比写一个开国时的将军或省委书记还要有价值。”

老江这番真诚的话，对我启发很大。于是，我的采访和资料搜集工作，就先围绕着萧也牧进行。可是，当一些重要的采访线索接连中断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动手太晚了。最了解萧也牧的张羽和黄伊已不在世了，等我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和萧也牧的大儿子联系上时，方知萧也牧的夫人李威

也在我准备采写这本书时含恨长逝了。加上一些杂务的干扰，使我的采访和搜集材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一年，也未能开笔。直到见到张羽的遗孀杨桂凤，得知张羽生前曾想写《萧也牧传》，并把张羽当年采访李威、康濯等的一批采访记录慷慨地提供给我之后，我才得以掌握了许多珍贵的史实，揭开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真相，开始了《萧也牧悲剧实录》的写作。尤其是建国初丁玲、冯雪峰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那场批判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终于梳理清楚了。而当代文学史上的这场公案，丁玲一向是以胜利者自居的。直到我的《萧也牧悲剧实录》在《江南》杂志上刊出上篇时，我在首都图书馆借到刚上架的《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一书，发现在这本厚达476页的传记中，竟还是把对萧也牧的批判放在《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一章中。其中，第367页关于毛泽东与丁玲在云峰巢的对话，比我在《萧也牧悲剧实录》中引用的还要详尽：

毛泽东等人坐定后，陈明让公务员张来福搬来两个大西瓜，甘露张罗着给客人们切好西瓜。丁玲递给毛泽东一盘，毛泽东吃着西瓜，笑着说：“好吃，好吃。丁玲，近来躲在这里写什么呢？”

丁玲：“嗨，平时工作太杂，写得不多。这两天写了一篇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谈了我的一些看法。”

毛泽东：“前些天《文艺报》上也有几篇批评文章，火力还很猛嘛！”

丁玲：“对，他的这篇小说倾向有点问题，但《文艺报》的那几篇文章言词激烈，似乎有点过分。有什么问题，平心静气提出来，帮助作者纠正，真正达到以理服人，又促进团结，才好。”

毛泽东：“你这个意见是对的。不过我看有些知识分子进城以后，就有点翘尾巴，也不是一个好的倾向。中国有好几百万知识分子啊，要团结，也需要改造，对不对？”

丁玲：“是的，目前所进行的文艺整风，就是很必要的。像当年延

安文艺整风一样，通过学习，大家的创作思想更端正了，写出了一批有生命力的好稿子。”

毛泽东：“现在和延安的情况更不同了，各路诸侯，要统一思想，任务还蛮艰巨呢！这些秀才，进城冒得几天，又是《武训传》，又是《关连长》，弄得好起劲喽！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具体地反映历史思想，就显得批判能力不够，他们学得的历史唯物论就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有些人甚至向反动思想投降。这就说明，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急不得，也迁就不得……”

丁玲：“对的，我们一定按照中央的部署，把这次文艺整风抓好。”

毛泽东：“好嘛！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任务。”

就在这项“长期任务”中，由拿批判萧也牧开头刀，再经过反右运动到“文革”，整倒了多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啊！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深受极左之害的丁玲，复出后依旧认为她当年批判萧也牧是对的，以至在一本又一本为丁玲唱赞歌的传记中，依旧是非颠倒，把她对萧也牧的错误批判，当作紧跟毛泽东的光荣历史，书写在所谓“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的光荣簿上！读罢《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中的上述文字，就更使我感到，我动手写这本书尽管晚了，但毕竟是为把这页被颠倒了当代文学史再颠倒过来，尽了绵薄之力。

遗憾的是，我未能在江晓天在世时完成他的嘱托。虽在写成《萧也牧悲剧实录》之前，我陆续发表了《〈红旗飘飘〉的创刊与停刊》、《〈红日〉是这样喷薄而出的》和《一部〈红岩〉血凝成》三篇文章，记述了他和萧也牧带领的那个团队所开创的部分红火的业绩，但直到江晓天病逝半年多后，我才写出《江晓天的编辑生涯》，完成了整本书的写作。行将搁笔之际，我不只叹息他们悲凉的命运，更感受到了他们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和奉献精神。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中真正的精英，我为有萧

也牧、江晓天这样杰出的前辈同行而感到骄傲！与此同时，回顾这本书相当艰难的写作历程，也感到历史上的许多现象以至细节，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采写他们的故事，我往往会联想到自己曾经历过的创业艰辛、奋斗坎坷和成功喜悦。可以说，我是在写前辈的命运，品自己的人生。我相信，文学编辑和广大读者的心是相通的，萧也牧、江晓天他们编辑出版的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优秀文学作品，曾经哺育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那么，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神圣的职责和悲剧的力量，也一定会鼓舞我们去开创光辉的未来，迈向更加崇高的人生境界吧！

石 湾

2009年6月8日

目 录

1

缘起

1

萧也牧悲剧实录

2

新中国文坛绽放的第一朵鲜花

6

源于生活的新题材、新故事、新人物

14

陈涌打响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的第一枪

19

一封无限上纲的“读者来信”

27

文坛“总司令”丁玲得到了“尚方宝剑”

34

从“不过是个开端”迅即扩展为一场运动

42

正是丁玲的文章，“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

49

“背时晦气”的吴小武

59

做《红旗谱》责编是一种“高级的创作”

69

痛失《青春之歌》

77

“早春天气”里的有感而发

85

都是倒霉在诚恳和认真上

93

刻骨铭心的晴天霹雳

100

最大的希望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

110

“李威，对你我得说真话……”

118

他们的这种做法，不是党的政策

126

她要为死不瞑目的丈夫讨一个公道

133

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147	江晓天的编辑生涯
148	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的杰出代表
151	“《青年文化》报的历史作用真是不朽的”
161	“中青社是靠出青年文学读物起家的”
169	战略转移带来事业的一片红火
181	逆境中编发姚雪垠逆境创作的《李自成》
194	为《风雷》当责编与“利用小说反党”
206	一部书救活了一个出版社
220	一生都是作家的好朋友
233	《红旗飘飘》的创刊与停刊
247	《红日》是这样喷薄而出的
257	一部《红岩》血凝成



萧也牧悲剧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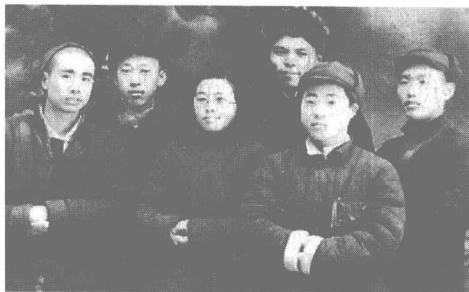
新中国文坛 绽放的第一朵鲜花

我最早知道优秀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是在1989年。那年，被人们尊为“国刊”的《人民文学》杂志，编印了一本精美的“创刊四十周年纪念册”。纪念册扉页上印的是1949年9月毛泽东应首任主编茅盾之请为《人民文学》创刊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正文开篇则是概述《人民文学》四十年辉煌历程的《合订本作证》。该文自豪地说：“一批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诗人，成为《人民文学》初创时期的主要撰稿人。我国现代文学前辈的重要文章，大多发于《人民文学》。新中国文坛上第一批涌现的新作者，在《人民文学》上献出了他们的处女作和成名作。”接下来，列举了这批“文学精英”所写出的好作品，赫然排在首位的，就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1999年，我在作家出版社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的编选和出版工作，约请陆文夫、崔道怡主编《短篇小说卷》，该卷的首篇，也是《我们夫妇之间》。小说文末注明：“1949年秋天，初稿于北京。重改于天津海河之滨。”这就是说，《我们夫妇之间》是一篇几乎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小说，是当代文坛上绽放的第一朵鲜花。它原载于《人民文学》1950年第一卷第三期，那时我还是不足10岁的放牛郎，因此，直到1999年，我才第一次看到这朵“重放的鲜花”。

熟悉当代文学史的人们一定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重放的鲜花》曾轰动一时。《重放的鲜花》是一部多人作品合集。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给中国文学带来勃勃生机，出现了一批眼光敏锐、关注社会问题的青年作家和诗人，产生了一批揭

萧也牧(右三)和李梦华(左一)等战友在晋察冀



露社会弊端的特写和小说。不久，“反右”运动给这批青年作家带来厄运，其作品被彻底否定，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二十多年后，这批包括王蒙、刘宾雁、陆文夫、刘绍棠、邓友梅、公刘、流沙河、李国文在内的当年的青年作家获得平反改正，重返文坛，成了新时期文学的领军人物。萧也牧也是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只因他的作品早在建国初期就被封杀，几乎被人遗忘，像《我们夫妇之间》这样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品，就未能得以收入《重放的鲜花》，再见天日。但有心的当事人是决不会忘记这朵新中国最早绽放的小说奇葩的。1985年7月9日，《人民文学》第一任小说组组长秦兆阳撰文回忆说：“《我们夫妇之间》原稿的文风非常朴实、自然、简练，字迹也十分工整清秀。那时《人民文学》来稿的水平很低，不作修改就可以发表的稿子几乎没有，收到这样主题新鲜而又不必加工的稿子，自然喜出望外，所以就一字不动，立即选送主编审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出来了。”（《随笔》1987年第4期）请注意，审查批准发表《我们夫妇之间》的主编，正是时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先生。

战争年代，秦兆阳在晋察冀的华北联合大学工作，早就从边区的报纸上看到过萧也牧写的通讯和散文，知道他的名字。建国以后，萧也牧几次约秦兆阳去中山公园的茶室喝茶，跟他谈论自己的写作构思，征求他的意见。秦兆阳感到他颇有些青春朝气，单纯、直率、随便，对创作充满自信。正是在与秦兆阳约谈了几次之后，萧也牧给他送来了《我们夫妇之间》。

刊发《我们夫妇之间》的这期《人民文学》是“新年号”。打开“新年号”，



解放战争时期的萧也牧
解放初期的萧也牧

在封面与扉页之间，编者特意夹了一张浅红色的题为《欢迎 1950 年》的诗签：

1950 年，
载着黄金的冠冕，
含着微笑
向我们来了……

我们向你欢迎，
用胜利的进军，
歼灭最后一个敌人；
用勤奋的耕耘，
犁开因战争而荒芜了的田园；
用急速转动的轮子和引擎
让祖国旋流着
鲜活的血液，
使亲爱的祖国
重新得到青春。

由这首诗，我们不难看出，编者是怎样满怀激情和欣喜，向读者推出这期“旋流着鲜活的血液”的“新年号”的。而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正是一位

年轻作家萧也牧



经受了战争考验的年轻作家,用“勤奋的耕耘”在“荒芜了的田园”上收获的“第一桶金”。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最早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说,出身知识分子的干部李克表现了与战争时期非常不同的精神向往,他希望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的情调。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重归于好。这篇小说大胆地提出工农兵干部面临着一个全面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的问题,这种超前意识无疑是它受到《人民文学》青睐的重要因素之一。难怪秦兆阳还回忆说:“现在,在事隔几十年以后,我不由得会常常想到,他跟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但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而且给人以非常真切的感觉。作者一点也不顾及别人可能产生的联想,这在解放初期那种政治气氛和道德气氛下,不能不说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确实,对于长期生活于战争状态的作家来说,城市生活无疑是其面临的新的挑战。萧也牧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关系,怀着一种干预生活的热情,才写出这篇成功表现新时代城市生活的小说。但一部作品的成功,单是作者有创作勇气还是不行的,如果遇不上慧眼识珠的好编辑,那也只是废纸一堆。在当时的文艺环境里,茅盾和秦兆阳能推出《我们夫妇之间》这样富有人情味和超前意识的作品,更显现出了一种超人的勇气和胆识。

源于生活的 新题材、新故事、新人物

我在读了《我们夫妇之间》后，正如秦兆阳所说，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小说中这对夫妇的原型莫非就是萧也牧自己和他的妻子？

萧也牧原名吴小武，1939年开始以“萧也牧”为笔名在晋察冀的《边区文化》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他1945年8月入党，先在晋察冀《工人报》当记者，后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他和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李威，就是在张家口工作期间结为夫妻的。

李威是河北正定县人，15岁参加革命。她父亲抗战前参加了共产党，她9岁就开始在晚上跟着父亲出去贴标语。父亲为躲避敌人的追捕，逃往山西，再无音信。她的二哥是八路军，参军后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后来，李威在当地的烈士碑上看到二哥的名字，才知他早已牺牲了。李威家是敌占区，起初她在妇女中搞地下宣传工作，送信、贴标语，后来环境残酷，组织上见她小小年纪，家里没人依靠，又没多少文化，1938年就把她安排到兵工厂学做钳工。她在兵工厂干得很出色，被评为劳动模范，很快入了党。在我着手写作此文时，李威已逝世近一年了。是前辈作家康濯的遗孀王勉思，最先向我提供了萧也牧、李威夫妇在晋察冀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认识吴小武夫妇，是在1946年底，那时候他们刚刚结婚，我和老康过年也结了婚，我们同住在一个村子里。不久老康被周扬派到平山县柴庄村，去总结‘穷人乐’——柴庄是一个在敌人包围中坚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模范村，演戏唱歌，进行气节教育，鼓舞斗志。那段时间，到了晚上，我经常到他们家闲坐闲谈。那时正是腊月，天寒地冻，李威常用小锅熬一锅白面疙瘩汤，没有油，只放点盐，



萧也牧(右三)和康濯(右一)、陈勃(右二)在张家口

萧也牧在晋察冀解放区出版的集子
上世纪 50 年代的李威

